

孙星衍的金石搜访与收藏

付云栋*

摘要：孙星衍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金石学者，是乾嘉考据学派的典型代表，其一生足迹遍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京都等古迹富集之地，所至之处，无不亲历访求金石，故其金石收藏极为宏富。本文以《寰宇访碑录》为根本文献依据，梳理归纳了孙星衍实地访碑、友人馈赠、出资购置等多种金石搜集的途径。同时依托洪颐煊《平津读碑记》中记录的孙氏藏品目录与考释文字，系统梳理了其毕生金石收藏整体规模、年代分布与地域来源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其藏品偏重秦汉隋唐碑刻而轻宋、元的收藏特色，并从注重实地访碑、自身宦游便利、交游网络助力、幕府人员辅佐四个层面，全面阐释其金石收藏规模宏富的深层成因，明晰孙星衍在清代金石搜集与著录体系中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孙星衍；金石搜访；金石收藏

Sun Xingyan's Epigraphic Exploration and Collection

Fu Yundong*

Abstract: Sun Xingyan was a renowned epigraphic scholar of the Qianlong-Jiaqing period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Qianlong-Jiaqing textual research school. Throughout his life, he traveled extensively to regions rich in ancient sites, including Shaanxi, Shanxi, Henan, Shandong, and the capital Beijing. Wherever he went, he personally visited and collected inscriptions and stone relics, resulting in an exceptionally extensive collection. Based primarily on Sun's work *Records of Visiting Steles Across the World*,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s various methods through which he acquired epigraphic materials—such as field visits, gifts from friends, and purchases. Drawing also upon Hong Yixuan's *Ping Jin Du Bei Ji*, which records Sun's catalogues and annotations of his collections, the study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overall scale, chronological distribution, and geographical origins of Sun's lifetime epigraphic holdings.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it further examine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collection—particularly its strong emphasis on Qin, Han, Sui, and Tang dynasty steles while neglecting Song and Yuan dynasty works—and thoroughly explain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his collection from four perspectives: his commitment to on-site exploration, the advantages of his official travels, his extensive network of scholarly contacts, and the support provided by his staff in military offices. This analysis clarifies Sun Xingyan's significant role within the Qing dynasty's system of collecting and documenting epigraphic materials.

Keywords: Sun Xingyan; epigraphic exploration; epigraphic collection

版权 © 2026 归作者及香港致源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本刊遵循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 (CC BY - NC 4.0) 开放获取。

详情请参阅：<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付云栋，男，西安美术学院书法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清代金石学。

自明末清初以来访碑之风日盛，金石著述层出不穷，清代金石学以顾炎武（1613—1682）《金石文字记》开先河，后来者又有黄宗羲（1610—1695）《金石义例》、叶奕苞（1629—1686）《金石录补》等，张德容（1620—1688）认为：“我朝自顾炎武、南原、朱竹垞诸老以金石佐经术，于是金石之学日盛。”^[1] 顾炎武是清初的著名学者，其著录金石主张以实见为主，身体力行，搜访金石，并能广征博引，为清代金石学打开了崭新的局面。至乾隆一朝，金石搜访活动更加火热，在清初强调实地访碑的基础上形成了访古金石圈，访古活动不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逐步发展为众多学者共同搜访的形式。因此，在前代学者的影响下，乾嘉时期学者更加重视亲访亲见，此时期金石学者众多，极具代表性的如孙星衍（1753—1818）、黄易（1744—1802）、翁方纲（1733—1818）、钱大昕（1728—1804）、王昶（1725—1806）、毕沅（1730—1797）、武亿（1745—1799）、阮元（1764—1849）等，访碑队伍规模可谓空前壮大。孙星衍无疑是其中的代表，其编纂的《寰宇访碑录》收集七千余种历代金石名目，而围绕此书开展的金石搜访活动则成为当时极为典型的金石交游范式。

一、孙星衍的金石搜访

孙星衍早年曾随钱大昕前往茅山访碑，所获唐钟、唐碣及宋、元碑刻数种，钱大昕曾作《游茅山记》十分详细地记录了此次访古的过程^[2]。乾隆四十五年（1780），孙氏受毕沅之邀入其陕西幕府，据《孙渊如先生年谱》载：“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君二十八岁。……陕西抚部毕公沅以母忧家居，闻君名，延之里第，与钱明经站同修《关中胜迹图志》。”^[3] 在毕沅幕府，孙星衍结识了钱站（1744—1806）、王昶、赵魏（1746—1825）等诸多金石友人，其与金石同好游于荒祠古寺与名山大川之间，竭力搜访金石瓦当，所获颇多。并且，其以此为脉络不断扩大自己的金石圈，这些友人也成为其获取金石的重要来源。在毕沅陕西

幕府期间，孙星衍确立了实地寻访、著录金石并考释文字、以金石证经史的治学理念，此后随毕沅至河南，又任职于京师、山东等地，所至之处无不寻访古物。因此孙星衍金石寻访的主要方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亲自寻访

实地访碑是乾嘉金石学者收集金石最主要的方式，乾嘉学派崇尚考据学，主张无信不征，眼见为实，彻底摆脱了明代学者辗转于金石书目的治学方式，以一种走出书斋的全新路径赋予了乾嘉学术极具特色的面貌。

孙星衍曾与邢澍（1795—1823）合纂成《寰宇访碑录》，但金石资料为孙氏提供，邢澍主要协助其编纂刊刻。《寰宇访碑录》成于嘉庆七年（1802），载三代、秦、汉至元代碑刻 7849 种，收录以石刻为主，包括了山东、陕西、河北、河南、山西、江苏等十五个省份的金石，不局限于某一区域，故而体量巨大，在乾嘉时期此书为收集金石最为全面者。此书之编纂始末，孙星衍在此书的“自序”中有着详细的说明，其不仅交代了能成此书的客观条件，亦说明了金石的来源：

昔邵学士晋涵纂书三通馆，檄取海内石刻进之内廷，编书以续郑樵《金石略》，录其副本，举以相赠，藏在行笈廿载有余。中间游学四方，思以目见手摸为之增补，盖尝西游河华，北集神京，东揽三齐，南穷越纽，所至山川城邑、古陵废庙，或有残碑断碣，无不怀墨握管拓本看题录入兹编，岁有加益，其足迹不到之处，又值同世通人名士，搜奇好异，邮示所获，扩其见闻。若今王少寇昶、钱少詹大昕、翁阁学方纲、冯编修敏昌、阮抚部元、黄司马易、武大令亿、赵明经魏、何文学元锡，皆为此学，藉以订正邵书，又增倍蓰。顷归吴下，获交邢明府澍，出以相质。明府博学洽闻，藏书万卷，复据筐篋所有补其不备，删其复重，乃始成书，刊以问世，题为《寰宇访碑录》。^[4]

孙星衍以为金石学始于汉《艺文志》，后来者有酈道元（470—527）《水经注》，魏收（507—572）

《地形志》，然未能有专书，故还不足以成单独专门之学，自宋欧、赵始有专书，然其时出土之物尚少，访碑亦未能形成风气，再加上偏居一隅，欲得全国之碑绝无可能。清代以来，海内统一，国家又十分重视金石学，再加上乾嘉时期访碑之风日盛，为前代所未有，故而访碑群体出现，人数骤升，金石亦大量出土，为此书的编纂带来了契机。此书之成始自邵晋涵（1743—1796），其于三通馆编纂内府所收全国金石，成书后，将副本赠予孙星衍，孙氏也有幸一观，《寰宇访碑录》便是以此为基础编纂而成的。

孙星衍一生游于江苏、陕西、河南、山西、北京、山东等地，其所至之处无不入山川古庙等处亲访亲拓，日积月累，又增补众多。其《京畿金石考》有云：“予自史官改授尚书郎，居长安者六年，退食之暇，往往搜访古迹。”^[5]在毕沅陕西幕府，其曾与友人结伴寻访金石，所获碑刻、瓦当众多，并将访古所得的金石汇编入毕沅的《关中金石记》中。在河南时，孙星衍曾亲访佛龕并拓其文字，其曾有跋语云：“洛阳伊阙多魏齐刻石，此佛龕药方在龕左右，字甚佳妙。方在《千金方》之前，余尝亲至其下，拓本以归。”^[6]在北京，其于政务之暇，按图索骥，访得京畿一带古刻众多，

编纂成《京畿金石考》。因此亲自寻访应该是孙星衍主要的金石来源。

（二）友人馈赠

虽然孙星衍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金石分布较为广泛的地区其皆曾来过，然要编纂全国性金石著作显然并非孙氏一人所能及，除其个人访得以外，其中诸多金石还来自友人的馈赠。在上文引《寰宇访碑录》自序中孙氏提到了诸多金石来自王昶、钱大昕、翁方纲、阮元、黄易、武亿、赵魏、何元锡（1766—1829）等友人的馈赠，现以《寰宇访碑录》为基础，按照孙星衍的标注，将友人寄赠的金石拓本作一表格（表1），这样能更加清楚直观地了解每个友人所赠金石的数量。

由表的内容可知，孙星衍编纂此书的过程中，金石友人如赵魏、黄易、王昶、钱大昕、毕沅、阮元等人为其提供了诸多的帮助，一共提供了五百余通金石，可谓数量繁多，因此友人的协助对此书的完成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出资购置

在孙星衍的金石收藏中，其出资购置较少，亦或许

是未曾记录。金石学者主动从碑估手中购买拓本的现象在清代十分常见，如武亿虽生活贫困，但亦能“闻乡人有新获自土中者，必属其多方秘护，或竟倍价购觅以归”^[7]。孙星衍也曾高价购得过《泰山刻石》（图1）：

泰山刻石，在山顶玉女池，近代毁于火，旧拓本至难得，余购得二本，以一金易一字。此刻为昉初

金石友人	金石数量	金石友人	金石数量
浙江仁和赵（赵魏）	129 通	江苏仪征阮氏（阮元）	3 通
浙江钱塘黄氏（黄易）	9 通	直隶大兴翁氏（翁方纲）	1 通
江苏阳湖赵氏（赵翼）	2 通	浙江钱塘何氏（何元锡）	22 通
浙江鄞县范式（范来宗）	115 通	江苏江都汪氏（汪中）	2 通
江苏嘉定钱氏（钱大昕）	69 通	江苏青浦王氏（王昶）	55 通
安徽全椒俞氏（俞肇修）	15 通	山西阳曲申氏（申兆定）	6 通
江苏吴县毕氏（毕沅）	2 通	江苏吴县张氏（张埏）	1 通
河南偃师武氏（武亿）	5 通	安徽歙县程氏（程敦）	12 通
江苏吴县袁氏（袁廷桢）	2 通	浙江海盐张氏（张燕昌）	4 通
江苏嘉定翟氏（翟中溶）	17 通	浙江钱塘陈氏（陈鱣）	3 通

表1 友人赠予孙星衍的金石数量表

居士所藏，笔画尤分明，洵足宝也。^[8]

由此可知，孙星衍曾以一金易得一字的价格购《泰山石刻》两本，并视为至宝。孙星衍出资购置的还有明孙承泽（1592—1676）藏汉《熹平石经》残字，翁方纲曾有题跋云：“渊如观察购得砚山斋汉石经遗字，为赋长歌于册后。方纲。”（图2）

二、孙星衍的金石收藏

乾嘉时期金石收藏蔚然成风，孙星衍热衷于金石碑刻的搜集，广收金石，构建了体系完备的私人金石收藏。其一生的金石收藏概况，洪颐煊（1765—1837）《平津读碑记》（图3）记载极为全面。

（一）孙星衍金石收藏概况

洪颐煊，字旌贤，号筠轩，浙江临海人。阮元抚浙期间成立书院诂经精舍，嘉庆五年（1800）孙星衍应阮元之邀与王昶主讲于此，《孙渊如先生年谱》载：“时抚部又设诂经精舍于西湖之滨，招致督学时所拔知名士于其中，与君及王少寇昶迭为主讲。”^[9]王昶与孙星衍在此讲学的主要内容以汉代经学为主，旁及小学、舆地等学问。当时洪颐煊入诂经精舍问学，成孙星衍门徒，这是两人初次相遇，洪颐煊读书甚勤，校书尤多，孙星衍对其很是赏识，两人常谈论学术，相处甚欢。

嘉庆十年（1805），洪颐煊进京参加会试落榜，后入山东拜谒其师孙星衍，并留任其幕府长达七年，洪颐煊曾云：“及余辛酉拔贡，壬戌入都应朝考，报



图1 《泰山刻石》廿九字明拓本 36 cm×42 cm
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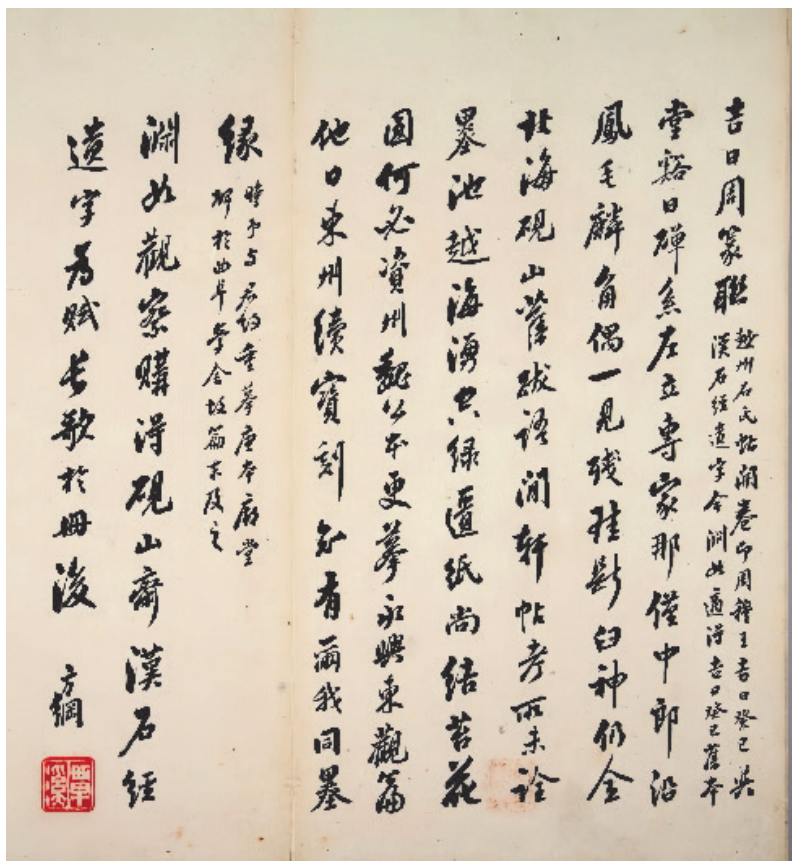


图2 清翁方纲跋《熹平石经残石》 尺寸不详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孙承泽鉴藏本

图3 清洪颐煊《平津读碑记》 尺寸不详 纸本
清光绪十一年朱记荣刻十七年朱氏行素草堂平津馆补刻本



罢，薄游山东，馆孙渊如观察幕中凡七年。”^[10]洪氏崇尚经学，善校勘，喜好金石，在这期间，协助孙星衍校书、著书尤多，成果丰硕。孙星衍任山东督粮道，居住于德州，德州为汉平原郡故地，孙氏以为鬲津至平原一带为平津，故名其馆为“平津馆”，《平津读碑记》即成于此时，据洪颐煊此书自序云：“渊如师喜金石文字，生平游历所至，搜访无虚日。德州平津馆所藏碑，自周、秦至唐末、五代，凡廿余匣。庚午冬，颐煊始取而读之，见诸君题跋未尽，闲有所获，辄录于左方，积成八卷，题曰《平津读碑记》。”^[11]可见此书是以孙星衍收藏的金石为基础，在整理之后，编纂而成的，孙星衍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此书刊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洪颐煊为孙星衍的门徒，入其幕府长达七年，此书所收金石应为洪氏亲见，孙

氏一生的收藏也能十分清楚的体现，故以此书为基础，作以下表格（表2），以期能更加清楚地了解孙星衍一生的金石收藏情况。

表2 《平津读碑记》中载孙星衍金石收藏情况表

朝代	金石数量	朝代	金石数量
周	3 通	秦	3 通
汉	62 通	魏	7 通
吴	4 通	晋	4 通
前秦	1 通	梁	4 通
北魏	39 通	北齐	33 通
北周	7 通	隋	16 通
唐	306 通	后梁	3 通
后唐	3 通	后晋	3 通
后周	7 通	南唐	2 通
北汉	1 通		

（二）孙星衍金石收藏的特点

通过洪颐煊《平津读碑记》成以上表格，虽然对其一生金石收藏的统计还不甚全面，如王昶在晚年曾将自己在陕西时访得的“汉雁足灯”（图4）赠予孙星衍，后得孙氏珍藏，此书中便未曾题及，但这也足以清楚的了解其金石收藏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首先，孙星衍的金石收藏在时间上起于周终于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的金石皆不在其收藏之列，展现了其厚古薄今的治学取向。这种收藏偏好主要受到乾嘉汉学的影响，彼时学者尊崇汉代经学体系，故形成了重汉、唐而轻宋、明的治学态度，这种思想渗透到金石考据的研究领域，所以五代以后的金石孙星衍便不作收藏。

其次，孙星衍金石收藏极为丰富，数量众多，由上表来看，周有3通、秦有3通、汉有62通、魏有7通、吴有4通、晋有4通、前秦1通、南朝梁1通、北魏有39通、北齐33通、北周7通、隋朝16通、唐朝306通、后梁3通、后唐3通、后晋3通、后周7通、南唐2通、北汉1通，共501通。其中，以唐代最多，汉代其次，这与时代有关，汉、唐两朝所存时间跨度长，且大兴立碑之事，故而碑刻林立。并且，汉、唐皆定都于陕西西安，孙星衍在此长达七年之久，诸多古碑其皆亲自搜访拓得。

最后，由《平津读碑记》所著金石出土地可知，孙星衍所收藏的金石主要集中于陕西、河南、山西、山东、北京等地，这些地方孙氏皆曾亲至，如其入毕沅陕西、河南幕府，其间又曾去过临省山西，后来又先后任职于北京及山东，应该说孙星衍一生足迹遍及多地，能够有机会在各地寻访亲拓，故而其金石收藏宏富。

总之，孙星衍收藏金石数量众多，时间跨度长，金石更是分布广泛，不局限于某地某时，其金石的获得大部分来源于亲访亲拓，完全继承清代金石学人亲历访古的治学传统与著录范式。在整个乾嘉时期，其金石收藏的数量及质量是极为可观的，故而其足以立足于乾嘉金石圈，对清代中后期金石学的整体演进产生了深远且关键的影响。

（三）富藏的原因

在清初金石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金石实践下，注重亲访，细致考证的基本治学思路已经形成，



图4 西汉 建昭铜雁足灯 尺寸不详 铜器
上海博物馆藏

时至乾嘉时期，斯风更盛，与清初相较，此时的金石学有着诸多显著的特征，金石学者陡然增多，金石遂出土日频，学者之间在共同访古、交换金石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石圈，这个金石圈是不断扩大的，孙星衍就曾因毕沅的地位和主动介绍识得了黄易、翁方纲等金石友人。在金石圈中，金石是不断流通的，金石成为友人之间长谈的话题，其结果便是诸多学者投入其中，钟鼎彝器、丰碑古碣日出不穷。孙星衍能富藏金石，并有机会纂辑成《寰宇访碑录》，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 得地利之便

孙星衍一生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古碑林立的地方其更是所居时间较长，故其有机会在闲暇之余访碑。其早年便曾与钱大昕前往茅山访碑，收获颇丰，后其应毕沅之邀前往陕西，此处金石众多，其收获颇丰，访得了前人未曾著录的金石数种，再加上毕沅、王昶等友人的共同参与，金石更是出土日盛，其还将所得金石赠予北京的翁方纲等人，不断扩大了自己的金石圈。在陕西其亦在毕沅的带领和倡导之下，独立编纂成了《醴泉金石志》。后孙星衍又随毕沅迁往河南，其在此访龙门等地，得古碑众多。乾隆五十二年（1787）孙星衍始任职于京师，京畿地区经济繁荣，历代诸多王朝皆建都于此，故而金石丰富，再加上琉璃厂为全国古迹汇聚之地，孙氏在此亦颇具收获。后其又任职山东，访泰山、孔庙等历史名迹，所得汉、魏碑刻众多。

2. 注重实地探访

亲历亲访在宋代便偶有出现，但由于斯学不甚兴盛，学者较少，还不足以形成风气。清初顾炎武等人大力践行此法，各地均能“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12] 故而此法大兴。至乾嘉时期，重视实学，信而有征，实地探访成为金石学者整理研究的关键一步，毕沅、王昶、黄易、孙星衍等人皆是如此。孙星衍在毕沅幕府，与友人搜访瓦当，拜谒昭陵，游访古寺，所获金石众多。在北京任职期间，其亦能“往还畿甸，渡易水，循恒山、龙兑之麓，经行二千里，虽飞书草奏，日不暇给，犹复怀墨□笔，驰马荒郊古

刹之间，冀获遗文故物。”^[13] 山东任职期间，更是在公务之余前往泰山、孔庙访碑，并编成《泰山石刻记》一书。这种实地探访的风气兴于清初，盛于乾嘉，在前辈学者的影响下，孙星衍秉承此法，故所获金石颇多，收藏颇富，且真实可靠。

3. 金石友人遍布全国

金石友人的一个重要作用便是能够在自己足迹所未至的地方访得金石而后寄赠，在这种金石互换的活动下，使得个人的金石收藏不断丰富，并能对全国各地金石的出土情况有深入的了解。孙星衍游于陕西、河南等地，为官于北京、山东，因此能结识诸多友人，这种结识的主要方法便是以金石为传递的媒介。上文已述，孙星衍的金石友人众多，这些友人并非仅在一地，而是常常多地变动，如翁方纲一生足迹至北京、广东、江西、山东等地，王昶至陕西、云南，毕沅至陕西、河南、湖北、山东等地，这些学者所至之处孙氏有些未曾前往，故而金石友人在访得古碑后，便屡次寄赠，孙星衍也因此得以丰富自己的金石收藏。

4. 为官一方，成立幕府，协助者众

孙星衍早年入毕沅幕府，在幕期间协助毕沅修订古书众多，故其在山东为官期间，亦效此行，招才纳士，所集文人学者众多，著名者如严观（1753—？）、顾广圻（1766—1835）、洪颐煊、严可均（1762—1843）等，政事之余，常主持编书，《寰宇访碑录》《平津馆金石萃编》便是在这种学术环境下编纂而成的。王昶生前曾期望孙星衍能续补《金石萃编》，并将所得元、明金石悉数赠予孙星衍，故其与幕宾严长明合著成《平津馆金石萃编》。另外，孙星衍编纂《寰宇访碑录》曾有邢澍、顾广圻等人的协助，如其曾因此书的发刊、编序问题与顾广圻商讨：“《访碑录》后四卷，曾否发刊？第一卷属付将无年月古碑列《十字碑》之后，

如吉日癸巳石鼓之类是也，祈为定之。”^[14] 并且，此书的诸多碑刻亦是幕宾协助搜访的结果。

结语

作为乾嘉学者中的典型代表，孙星衍受前辈金石学者的影响，主张实地寻访金石，并通过亲力亲为、友人的馈赠与出资购置的多元途径，广泛蒐集历代金石，构建其规模宏大、脉络清晰的金石收藏体系。其藏品上起周、秦，下至五代，地域横跨宇内，体现了其重汉、唐而轻宋、元的学术理念，彰显了崇古证经的治学取向。总之，在清代乾嘉访碑风潮之下，孙星衍的金石活动并非个例存在，而是其在时代浪潮中积极探索的结果。其深耕于考据的土壤，以此为根基，搜集、著录金石文字，以深厚的学养、宏富的金石收藏成为足以代表乾嘉金石学的重要人物。

参考文献：

- [1] 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 [M]// 桑椹．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263.
- [2] 钱大昕．潜研堂集 [M]．吕友仁，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766.
- [3] 张绍南，王德福．孙渊如先生年谱 [M]//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119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456.
- [4] 孙星衍．寰宇访碑录 [M]// 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 第 26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19851.
- [5] 孙星衍．京畿金石考 [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 [6] 陈鸿森．孙星衍遗文拾补 [J]．书目季刊，2011，45(3).
- [7] 武亿．授堂文钞：卷七 [M]．道光二十三年授堂遗书本．
- [8] 陈鸿森．孙星衍遗文再续补 [J]．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13(15)：262.
- [9] 洪颐煊．筠轩文钞：卷八 [M]．民国邃雅斋丛书本：25.
- [10] 洪颐煊．平津读碑记 [M]// 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 第 26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19347.